

# 弹指之间，幻化三千

## --美国华盛顿大学刘端裕教授访谈录

刘端裕教授，1978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系，1982年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传播学硕士学位，1991年在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获得大众传播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华盛顿大学数码媒体硕士课程部主任。刘教授历任美国普渡大学传播学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教授，同时，刘教授也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美国国际广播电视学会、美国报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学者。1994年，他在印尼策划成立全新电视台；2002年出任《亚太传播》和《互动广告传播学刊》等国际学术刊物的编辑委员会委员。这次2004年9月他来北京中央财经大学，获邀请为本校将建立的文化与传媒经济学院客座教授，提供顾问意见与指导学生。

清朝诗人张潮在《幽梦影》文中说：“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刘端裕教授曾在一本书的序言中为张潮文多加了两个境界：“数字时代，滑鼠玩月，虚拟现实，弹指之间，幻化三千。”回顾前半生的历程，刘教授认为自己实现目标的方式为“学学做做”，正于此“学学做做”之间，幻化出在冷静而矍铄的目光背后，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对岁月的深刻洞察。真的智者，必能为我们指明前行的方向。

问：首先想问一下您，您是如何定义成功的？您认为您已经成功了吗？

答：关于成功，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目标。我的目标就是成为一名国际学人，这又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来自全球的学生，我在斯坦福读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传播与国家发展)的硕士时，全班有二十个学生，十个来自美国本土，十个来自其他国家，包括丹麦，日本、马来西亚、厄瓜多尔，墨西哥、还有非洲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了不同的文化碰撞和冲击，对第二个方面国际知识也是很大的促进。同时，我现在招收的学生，基本按照三个1\3的比例，三分之一来自西雅图，三分之一来自美国其它城市，还有三分之一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另外，学术交流也是如此，去年有来自香港和马来西亚，今年有来自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的学生，他们来西雅图一个星期，上午学习，下午去Microsoft（微软）、波音(Boeing)等大公司总部参观，晚上有晚会等活动，这种交流非常有益，也是国际学生的一个方面。第三个则是国际交流，一方面包括请世界各地的学者来华盛顿大学做交流，同时我也去全世界参加各种论坛演讲获取新的信息。

有了目标，则是达成目标的方法问题。这里我采取的是“学学做做”的策略。怎么学

学做做？一方面就是读书，在大学里面获取专业知识。我本科从香港中文大学的新闻与传播专业毕业后即投入新闻的第一战线。工作两年后也就是1979年随即进入斯坦福读硕士，在斯坦福待了三年，其中有一年去了纽约。毕业后82年开始工作了两年，随后84年到91年则是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读博士，读完了随后则去普渡大学任教。三年之后也就是94年，我觉得我必须得再出去学学做做了，因为我发觉我在大学讲的案例已经都是一些“war story”（老掉大牙的故事），也就是跟日新月异的现实世界脱节了，所以我选择了走出去。当时正好印尼需要成立新电视台，于是我就以顾问的身份参与了高层管理工作。只是想去休假一年的，结果一工作便是四年半，后来因为97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印尼的“排华事件”等等因素重新回到了校园。1979年我在斯坦福读硕士，1999年我又回去做访问学者，因缘际会，命运巧合。

实现了目标之后自然不能裹足不前，同样需要不断寻求新的目标。于是2001年根据当时的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市场需要，我在华盛顿大学创办了数码媒体这个硕士项目，作为课程部主任，我的新的目标则是把它做到全世界最好

关于幸福，美国学生中有种说法叫“3C”即是“cash, credit card, car”（现金，信用卡，汽车），在资本主义社会，对物质的追求是永恒的。现在我们改为“4C”增加了一个“commitment”，也就是增加他们的承诺和社会责任感。同时我们现在着重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CARE”（关怀）---即是commitment, aspiration, respect & entrepreneur（承诺，意念，尊重，创业精神）.这四个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学新闻传播出身，过去25年，在新闻采访前线上，在大学教坛前，以及在电视广播与新科技公司的会议室内，都与新旧媒体有亲密的接触。有时我是以参与者的身份，有时以局外人的身份，月旦新旧媒体的未来发展方向。我是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这就是我所说的“学学做做”策略。我的经验，是因缘际会。我也希望我的学生既有学术能力，又有实践经验，这是“双剑合璧”。

问：一个人之所以最后成为这样的人，必然和他成长的时代，成长的背景息息相关，能介绍一下您成长的环境吗？

答：其实我的成长环境比较单纯，25岁前没有离开过香港，除了去过广东的四个城市。因为我有信心我一定能到美国。我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是惯常使用英文的，所以坐飞机到旧金山的第一天，出机场后我没有一般人遇到的明显的隔阂感，感觉这个地方似曾相识，分明在梦中来过。而且由于我从小成绩就一直不错，所以父母也比较放心给我很大自主权，人生的很多决定都是自己独立做出。

问：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去斯坦福读硕士？能谈谈您在斯坦福的生活吗？在斯坦福与香港中

文大学读书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答：（笑）因为斯坦福的是最好的啊。哈佛没有新闻传播学这个专业。当时是中文大学的系主任余也鲁教授把申请表寄到我家来的。事实上我只申请了一两所大学，收到斯坦福的通知我立即就去了。说到不同，确实有很大不同。我也说过以前我们在香港读书都是用英文的，考试也拿A，托福也可以，但是在口语方面仍然欠缺。我记得很清楚，到旧金山的第二天，朋友接我然后去冰激凌店。当时服务员问我“Do you want a regular cone or sugar cone?”我一下就蒙了！不知道什么是regular cone（平常味道），什么是sugar cone（有甜味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学生一定要注意口语能力的培养，尤其是习语的学习。我建议以下三个方面：一个是看电视，看电影，不看字幕的；第二个是去超市学习，看英文的商品名，那就是活生生的免费单词卡片啊，当然我们可以拿百货公司的catalog（目录）进行学习；第三个方面则是交流了，English corner等等。

问：在斯坦福有什么收获和遗憾？如果再给您一次机会，您会做什么？

答：收获的确太多，如果说遗憾我只能感叹在斯坦福待的时间为什么只有两年，而不是二十年。

问：就真的没有什么挫折吗？

答：当然我也想编一个很苦的故事出来，但事实上一直都非常顺利。当时没去斯坦福之前也有很多憧憬，那时我们看的主要是一些台湾人写的书讲在国外读书与生活的感受。我记得我看了一本《吃马铃薯的日子》的书，就是写六十年代在外国读书很辛苦，要到餐馆打工找学费与生活费用。但我们出去时已经是七八十年代，确实非常轻松。刚下飞机就有朋友开车来接去吃冰激凌。我跟丹麦的日本的我们三个同学非常好，经常一起去咖啡馆“侃大山”，开车出去玩。而且学业上也不会担心，后来读博士当时在国际论坛上发表论文，我发表数量得分在专业内是全世界第二的。

这个情况，在我做大学教授时，我也看到两种学生，一些是物质条件是比较充裕，不是一些是很艰苦。他们各自有不同的感受与回忆。

问：性格决定命运。从一名普通的名校毕业生到在美国名牌大学占得一席之地的华人教授，您认为在您前半生的奋斗中最值得骄傲的品质是什么？您区别于别人最大的个人特质是什么？

答：我想，首先是我有很明确的目标，然后是我没有放弃我的追求，再者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吧。我确实是比较顺利的。我们有句话叫做“Beat them in their back-yards”（在他们的后院赢他们）。我想我做到了。

问：您在美国学习期间以及现在作为大学教授，有没有受到过区别对待，也就是说有没有受到过歧视？

答：完全没有。我的目标也包括做一个global citizen。1979年9月17号的晚上十一点多我到了旧金山，一下飞机，完全就跟在自己家一样。后来我们也有“host family”（美国家庭做我的“家长”）我跟那一家人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可以说我们是成功打入了美国社会。当时我在普渡大学教新闻写作，刚开始也有学生觉得奇怪，一个外国华人来教美国新闻写作，但教了一学期后我坚信自己是有这个能力的，很多美国人文法错误很多的。而且我的同学都来自世界各地，文化的包容性也很强，但是我是看到有歧视的案例。以前，我们说美国的社会是“大熔炉”（melting pot），现在我们说美国是“大沙拉碗”（salad bowl），意思是“我们是一起，但是我们也是分开，不过我们是平等的”（We are separate but equal）。不过，经过美国总统2004年的大选后，美国社会可能已经变成“麻辣火锅”，社会两极分化。

问：在去美国之前，您有怎样的工作经历？您对刚出大学校园的毕业生有什么样的建议？

答：我认为学习和实践的结合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有经验的人带领与帮助我们。我们在华盛顿大学的课程有一个“mentor system”（即顾问制度），是请一些有名望的人每年带一两个学生，每学期至少见两三次面。这样不仅能将这些精英人士的经验言传身教给学生，而且也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机会。我们同时很注重培养学生的networking（人际网络）能力，也就是建立个人的人际网络，比如建议我们的学生印制名片就是基于这个理由。同时我认为个人形象非常重要。我们中国的传统认为不可以貌取人，事实上正好相反，一个人的外表形象非常重要，一定要整洁，要个性，要professional（专业）。有句话叫做“Image is everything.”（形象代表一切）。比如在美国，有的女生她擦紫色的眼影，就会配上紫色的袜子，是非常讲究的。但我们看到很多中国的学生，比如男生头发长了不加修理，穿短裤配黑袜子和皮鞋都是很不太雅观的表现。我自己就很注重executive look，即所谓的行政装扮，礼仪。

问：您认为美国的媒体运作与中国有什么不同？比如CNN和CCTV？

答：主要有以下几点不同：一是美国的媒体是一种商品，中国有一部分是宣传工具。第二是美国有80%的电视台节目是请外面的独立制片人制作，这样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第三是中国的电视台是中央一级，省为下一级，再接下来为市和县。在美国没有这样的区别。很少有地方的电视台，比如一个大公司，地方附属台（affiliates）所需要做的仅仅是新闻这一块，而其它部分在各个地方都是可以转播的，在中国可能每个地方台都有自己的一套，完全不同。另外就是美国有很多独立台（independent stations），这样跟国内的结构是很不一样的。中国的广电集团也起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觉得单是谈股权，融资与上市，并不代办是走向市场化。这是很大的问题，需要我们多研究，找出所谓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结构与经营管理”，还有很多要思考的方面。

问：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有一定担忧就是说当新闻变成传媒后，新闻完全成了一种商品，这会造成广泛的影响，引起一场严重的人文危机，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答：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一方面这是一个受众选择的问题，当受众的整体欣赏水平提升后自然会选择合适的传媒产品。另一方面是传媒产品是分高中低档的，我们并非只提倡高档的东西，事实上电视节目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通俗的商品。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的人喜欢听古典音乐，看高品质的节目。但所谓的开卷有益，并不囿于高档的阳春白雪的东西。第三则是政府和新闻主管部门也有一部分引导职能，要提供主流和非主流的东西，另类的东西，提供多样性的选择。

问：生活即是被选择。当遇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时，您一般如何作抉择？

答：事实上是没有必赢的局面出现的，不同的选择一定是各有长处和短处的。而在权衡各种利弊的基础上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follow your heart。这也是我经常跟我学生讲的。在你心里一定是有倾向性的，所以follow your heart 非常重要。

问：离开生长的土地,去国离乡，奋斗着安身，安身之后如何立命，应该是您经常思考的问题吧。目前您主要做些什么工作？可否谈一下您的职业发展目标以及未来的打算？

答：首先，我已经讲过我希望成为一名国际学人，其次，现在我主要希望我的数码媒体硕士这个项目能做到全世界第一。如果达到之后我当然会再设立新的目标。变幻才是永恒，我们需要日新、日新、日日新！

## 後記：

在2018年初，劉教授在舊金山大學任Kirayama Professor 期間, 構思了一個名為”University Without Walls “ Bridging the Pacific via Video live streaming 教學模式。用Zoom live streaming 開辦和主持了一個系列教學工作坊. 參與這個工作坊的學生們是身在三地（香港，台灣和美國），四間大學，（舊金山大學，香港城市大學，浸會大學和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客席導師們在香港，西雅圖，三藩市，大家同時參與上課，劉教授認為，大學上課，不用拘限在同一課室和同一個時間，而是可以在世界不同地方上課，即時互相切磋交流。當日創舉，Zoom亦用劉教授的教學模式為公司宣傳。想不到在今天2020年，劉教授當日對未來教育模式的想法“ I belief this will be the future of teaching “ 已經變成事實。這亦可印證劉教授在2004年訪問中所說，變幻才是永恆，他追求亦做到在傳播和教育領域日新，日新，日日新！